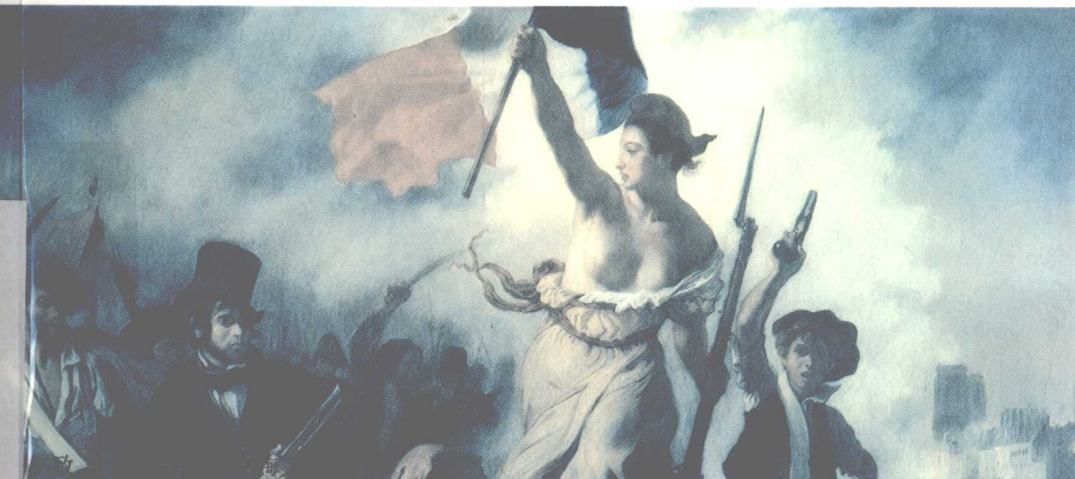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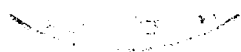


格致学术译丛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著
洪庆明 译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著
洪庆明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法)勒费弗尔(Lefebvre, G.)
著;洪庆明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格致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5432-1732-4

I. 法… II. ①勒…②洪… III. 法国大革命(1789~
1794)-研究 IV.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930 号

责任编辑 高 璇
封面装帧 陈 楠

格致学术译丛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

[法]乔治·勒费弗尔 著

洪庆明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193,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732-4/K·179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古老而智慧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绚烂的文化，先秦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基本界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并且演生为内在的精神价值，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规约着这片土地上亿万斯民的心灵世界。然而，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以及斯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不仅让我们对那些来自海洋异质文明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而且在这种了解背后更承载着文化和现实的双重使命。自晚清第一批试图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方学术文化，形成中国西学译介涓涓细流，逮及民国时代新学人的大力引进而渐成滔滔之势。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习知，更希图通过对西学的了解，滋养和更生己国之国民精神，以实现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急切历史诉求。

时至今日，中国致力社会现代化的努力和全球趋于一体化并肩而行。尽管历史的情境迥异于往昔，但中国寻求精神补益和国家富强的基调鸣响依旧。在此种情形下，一方面是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仍然渴盼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图将之融入我们深邃的传统，为我们的文化智慧添加新的因子，进而萌发生长为深蕴人文气息、批判却宽容、自由与创造的思维方式。惟如此，中国的学术文化才会不断提升，中国的精神品格才会历久弥新，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最为坚实长久的支撑。

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辞辛劳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对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均起了不容否认的作用。尤其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中国出版界的开放和繁荣,引进和翻译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更呈光大之势。

此等情形,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超越梦想的潜在表达——吸纳外来文化之精粹,实现自我之超越,进而达至民强而国富的梦想。一如中国经典所言:“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本社欲倾力推出“格致学术译丛”,其宗旨亦在于此。

我们期待能以“格致学术译丛”作为一个小小的平台,加入到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西学引介潮流中,为我们时代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精神建设添砖加瓦。热切地期盼能够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联手组构为共同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不图急切的事功,不事抽象的宏论,更不奢望一夜之间即能塑造出什么全新的美好物事。我们只须埋首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责,相信必有和风化雨之日。

陈 恒

勒费弗尔以来的法国革命史学及其转向(代译序)^①

勒费弗尔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家之一。他对法国革命史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的专门性著作,将农民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置于大革命史的中心舞台;他的一般性著作,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解释体系,成为至今仍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大革命经典解释;他是法国史学界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和重视集体心理史的先驱。同时,勒费弗尔倡导的集体合作研究方式,精心主持的革命史学研究杂志和大量发掘的革命史材料,都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进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交厚的学者,勒费弗尔通过对农民和革命心态的研究,成功地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到了一起,是这个时期法国史学发展变革的原动力之一。

通过缕述勒费弗尔丰富的学术人生,我们还能较为清楚地看到大革命传统对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思想和政治观念的至深至远的影响。勒费弗尔不仅将自己对共和的热爱倾注于他的学术研究中,而且亦力图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加以践行。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思潮兴起,共和体制风雨飘摇之际,他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跳

^① 本文前后部分经删改后,以“历史的当代阐释典范:半个世纪来法国革命史学研究述略”和“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研究述论”为题,分别发表于《史林》2009年第3期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在此谨表谢意。

出历史为自己的时代呐喊,期望以此唤醒法兰西的民族激情,重扬大革命时代的民主理想和牺牲精神。

晚年的勒费弗尔,借助巴黎大学完备的学术研究机制,依然活跃在学术一线。巴黎大学这座法国革命史研究首屈一指的重镇,吸引了当时包括索布尔、苏拉多和英国的鲁德、科布乃至日本的高桥幸八郎在内的诸多杰出学者聚集于此,成就一时之盛。他所阐释的法国大革命几乎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来自西方尤其是英美右翼史学家的攻击也在此时开始了。最先发难的是伦敦大学革命史讲座教授阿尔弗雷德·科本,此后许多英美史学家纷纷步其后尘。递及60年代中期,法国年鉴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孚雷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双方经过25年的苦涩论战,到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来临之际,修正派史学家颠覆了传统解释中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和资产阶级创世说,转向政治文化解释。曾经被视为附从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文化,如今在修正主义史学家眼里成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决定因素,大革命史学研究从方向到方法因此皆产生了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巴黎大学也不再是法国革命史研究唯一的中心,曾经高扬了人类民主价值的大革命,将这种价值贯穿到了对它自身的研究之中,可以说这也算是它以独特的方式再次张扬了自己对于文明的意义。

递及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修正派史学家纷纷退休或辞世,尤其是这个时代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变化,法国革命陷入了一时相对沉寂的状况,社会经济解释没有重新得势,修正史学也未统领革命史的研究模式。大革命史不再限于此前“正统一修正”或曰“社会史—政治史”之争的模式,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们,在继续探索政治话语、表象模式和革命想象的同时,亦厌倦了那些修正派的虚空话语,开始探讨革命者自身的具体经历(experience),注重革命过程中的阶级、利益、实践、观念等历史现实的层面。

借翻译勒费弗尔的这本经典著作之机,笔者试图对这个显得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乔治·勒费弗尔 1874 年生于法国诺尔省中心城市里尔,是法国大革命史学的“长老人物”。^①他终生孜孜不倦地在档案中探幽发微,其连绵不断的厚重著述,使他获得了这一声誉。到 1959 年辞世时,勒费弗尔被公认为他那一代甚或是任何一代最为杰出的大革命史学专家。

勒费弗尔出身微寒,依靠奖学金方得以完成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教育,1898 年,通过考试取得教师资格。此后,他一面在中学执教,一面进行艰苦的档案资料搜集工作。经过整整 20 年的艰苦努力,1924 年,勒费弗尔终于完成了他洋洋百万言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他以浩繁的税务清册、公证人记录和乡村当局登记簿等档案文献为基础,透彻地分析了大革命对诺尔省乡村各个方面的影响。^②在这部著作里,勒费弗尔娴熟地利用统计方法以及从农民的角度审视大革命,全书仅统计图表即有 200 页的篇幅,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好评,当时声名卓著的大革命史学者马迪厄撰文评论说:“此书包含有好几篇截然不同的论文题材:封建权利、捐税、国有财产、最高限价、恐怖、宗教问题等。大革命的社会史还从未有过这种深度和广度的研讨。”^③这使勒费弗尔得以在克莱蒙—费朗大学谋得一份教职;1928 年,马克·布洛赫将他引介到斯特拉斯堡大学;1935 年前往巴黎大学任教。两年后,63 岁的勒费弗尔继萨尼亚克(Sagnac)之后担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方从这个职位上完全退休。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全面详尽地探讨了大革命期间诺

① Peter M. Jones, “Georges Lefebvre and the Peasant Revolution: Fifty Years 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6, No. 3, (Spring, 1990), p. 645.

② Georges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omes, Paris, 1924.

③ 转引自王养冲:“论法国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载王养冲编:《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第 246 页。

尔省农村取消封建主义和教会什一税、土地转移、集体权利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深入乡村所带来的结果,他认为,大革命促成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和乡村社区的转型,创造出一个与大革命成果和私有财产原则休戚相关的农民产业主阶层。^①勒费弗尔的这部著作,不仅一反法国大革命史领域在19世纪漫长的政治史传统,将20世纪初饶勒斯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②中所倡导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深入,而且开辟了大革命史领域从社会下层群众研究大革命的潮流,他的一些学生将他的农民运动命题,“应用于研究城市的人民群众”。^③

1932年,勒费弗尔又推出了两本关于农民与革命的力作:《大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和《1789年的大恐慌》。^④尤其是后者,标志着勒费弗尔不仅一如既往地关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现实状况,而且将史学目光延伸到新的领域,也就是社会心理史。^⑤勒费弗尔在该书中以浩繁的史料为根据,分析了1789年法国各地迅速蔓延的恐慌情绪的产生、发展和作用。在他看来,1789年的恐慌情绪是久远的法国式文化心态与政治现实辐辏的产物。也就是说,长期贫困的小农社会催生出法兰西民族集体的阴谋忧虑和抗争记忆:经常性的饥饿威胁,使法国民众相信有人故意囤积粮食制造饥荒,法国民间长期流传着有关贵族囤积粮食的传说,由此形成深深的“阴谋忧虑”心理,且经常演变为暴力的反抗;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未忘记过,每次扎克雷、每次农民起义、穷苦人对领主的每次反抗,都以屠杀而告终”。^⑥这种惨痛记忆酝酿而成的民族集体心理的遗存,

① 对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一书的精彩评述,可参见 R. R. Palmer, "Georges Lefebvre: The Peasan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1, No. 4, (Dec., 1959), pp. 329—342, 本文不再详述。

② J. Jaures,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 Tomes, Paris, 1901—1904.

③ A. 索布尔:“传统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与修正的企图”,载王养冲编:《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第169页。

④ G. Lefebvre, *Questions agraires au temps de la Terreur*, Strasbourg, 1932; *La Grande Peur de 1789*, Paris, 1932.

⑤ William Halperin(ed.), *Some 20th-Century Historians*,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p. 59.

⑥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New York, Translated by Joan White, 1973, p. 93.

与大革命前夕广泛流传的“贵族阴谋”和“匪患恐惧”一拍即合,扎克雷等鲜血留下的教训,使他们深信贵族阶级肯定要进行反扑,相信由贵族资助组织的土匪和外国军队就要清洗各省,从而激起他们的防卫反应和惩戒意志。

如果说城市平民的惩戒意志是拿起武器支持资产阶级“市政革命”的话,那么农民则是发动了针对封建领主的土地暴动,且产生的效果更为重要,“它导致了领主体制的倾覆,给从前那些业已过去的农民起义增添了一次新的扎克雷。”^①因此,勒费弗尔在他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强调:“革命心理的这三个方面——恐慌情绪、防卫反应和惩戒意志——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铺陈开来的关键之一。”^②

除上述的著作之外,勒费弗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农民与革命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如《旧制度末年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的分配》、《国有财产的出售》、《法国大革命与农民》、《革命群众》,等等,后均收入论文集《法国大革命研究》。^③他以详实的统计数据 and 证据,证明农民革命是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交织互动,其间以取消封建主义、教会什一税、贵族特权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为特征的社会革命,将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一系列博学而论证严谨的论著,勒费弗尔将大革命史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他以翔实的史料为支撑,从社会经济层面到心理结构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从原因到结果的全景式的所谓农民革命图景:(1)土地分配问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主义压榨是促成农民积极、主动和有目的地起而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数个世纪以来的“阴谋忧虑”的集体心态则是社会心理上的原因;(2)农民革命是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它在其源起、进程、危机和趋势方面都具有自主的特征”。^④他们的问题无论

①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p. 209.

② Quoted from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 to 1793*, Translated by E. Moss Evanson, Columbia Univ. Press, 1962, p. 122.

③ Lefebvre,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54.

④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ysans”,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249.

在陈情书还是在国民议会里都没有得到些微的关注,于是,他们将正当的事业抓到自己手里,“通过拒纳各种租赋和什一税,焚毁地契文书乃至领主城堡解决了争端”;^①(3)就性质而言,农民革命具有反资本主义的色彩。依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在革命中以分割大地产,加剧了法国的土地析分程度,从而延缓了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介入革命进程的影响“保守成分和革命成分一样多;他们摧毁了封建制度,但他们也强化了法国的土地结构”。^②

其次,他的农民革命解释,修正了一些传统的大革命史学观念,丰富了对于革命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尽管勒费弗尔的前辈以及与他同代的史学家都没有完全忽视农民的角色,正如彼得·琼斯在一篇综述文章中所说的,但他们描述的革命“主要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殊死争斗”;“尽管农民短暂地现身在这个角斗场中,但他们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辅助力量,而非作为第三力量”。^③勒费弗尔则改变了这一切。在勒费弗尔那里,农民不仅在1789年自发地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大厦,给资产阶级的国民制宪议会提供了力量支持,而且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亦是迫使资产阶级革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满足农民愿望的法令。也就是说,勒费弗尔将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带上了大革命的中心舞台,从而使有关大革命的起源和进程的解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交互图景。

二

除上述诸多研究农民与大革命的专论之外,勒费弗尔还撰写了一些综合性的大革命史著作,并作为大革命史学经典影响着修习该领域的学

①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ysans”, p. 259.

②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ysans”, p. 257.

③ Peter M. Jones, “Georges Lefebvre and the Peasant Revolution: Fifty Years On”, p. 647.

生和专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150周年,勒费弗尔出版了一本简明精炼的小册子——《1789年》,概述了大革命爆发复杂曲折的过程。^①在该书中,勒费弗尔将大革命视为“一种新的财富形式——流动财富或曰商业财富,以及一个新的阶级——在法国被称为资产阶级”兴起的产物。在他的描述中,大革命的降临是个环环相扣的四幕剧:贵族、资产阶级、城市民众和农民轮流占据着舞台的中心。每一幕中都首先简要分析所涉阶级群体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然后缕述事件发生的主要过程。^②

如同他的前辈奥拉尔一样,勒费弗尔作为法国共和制度的忠实拥护者,这部著作完全沉浸在1789年的丰功伟绩中,充溢着对1789年法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激情的称颂。它最初的版本里有8幅反映1789年诸事件的插图,其中包括三级会议开幕、网球场宣誓、攻占巴士底狱和一个《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导言的页面。^③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不久法国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纳粹支持下的极右翼维希政府不希望看到左翼史学和对大革命的同情式理解,遂下令查禁此书,约有8000册被焚毁,仅约200册幸存下来,乃至直到1970年再次重印时,它在法国本土几乎无人知晓。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7年,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将之翻译成英文出版,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降临》^④,成为英语世界研究法国革命的基本读物。到勒费弗尔去世时,1947年的普林斯顿版大学和1957年Vintage书店的平装本共卖出约50000册。“它至今依然是、并

① Lefebvre, *Quatre-Vingt-Neuf*, Paris, 1939.

② 关于该书内容的简要概括,可参见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 Press, 1980, pp. 8—9.

③ Beatrice F. Hyslop, “Georges Lefebvre, Historia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 No. 3(Spring, 1960), p. 279.

④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 Press, 1947. 笔者之所以译为“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意指1789年如同神降人间,因为在勒费弗尔乃至左翼史学传统对大革命的认识中,以及对于第三共和国以来的法国共和制度而言,1789年是一个起源的元年,是一位带来合法性的女神。

将继续是一部经典：一部由本学科大师撰写的历史著述典范。它对法国旧制度之死亡痛楚及其致死病因的分析，多年来一直是权威性的。”^①

帕尔默的译本删略了勒费弗尔原本的结论里的两个段落，明了此点，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这本著作遭到维希当局封杀的原因。这两段包括吁求1939年的青年不要辜负《人权宣言》的传统，要将法国缔造为一个自由人的民族。比照1789年的改革激情以及1793—1794年的牺牲和服务精神，勒费弗尔显然对大战前夕法国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失败主义情绪深感不安。因此，“他跳出历史的过去，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呐喊，以唤起对民主理想的支持。”^②

在勒费弗尔一长串卓越的书目最后，是1951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③这本堪称鸿篇巨制的著作，时间跨度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世界贯穿到拿破仑时代。这一方面反映他多年不懈的个人研究和广泛研读相关论著——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的论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诸如大恐怖的心理起源等论题的深刻洞察。^④

在这本综合性的著作里，勒费弗尔对大革命给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解释体系。按照他的解释，在革命起源方面，贵族反叛破坏了王权权威后，据有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乘虚而起，它要建立一个基于德能而非出身的新秩序，从而使反对王权权威的斗争扩大为对特权的攻击。在面临国王和贵族反扑之时，资产阶级得到了城市平民和农民暴动的有力支持，使它最终得以成功地消除旧制度的特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这一胜利的标志性文献，“这份文献宣布了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它实际上是被民众革命消灭了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⑤在革命的发展方面，阶级斗争同样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控制着国民制宪议会的

①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7.

② Beatrice F. Hyslop, “Georges Lefebvre, Historian”, p. 279.

③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51. 这本书是勒费弗尔在他以前所撰的有关大革命各个时期的著作基础上综合而成，具体可参见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 to 1793*, p. xiii.

④ Halperin(ed.), *Some 20th-Century Historians*, p. 60.

⑤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 to 1793*, p. 130.

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激怒了要求平等公正的巴黎工人,尤其是无套裤汉。他们与资产阶级左派雅各宾党人联手夺取权力,从1793年夏开始进行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但由于阶级本性使然,雅各宾派拒绝满足工人的经济要求,乃至失去支持,从而在热月9日被剥夺了权力。接下来,面临着无套裤汉和王党分子敌视的督政府,在经济困难和列强干涉的内忧外患下风雨飘摇,资产阶级转而求诸强人统治,一个允诺履行资产阶级社会议程的军人——拿破仑因此取得了权力。

勒费弗尔的这种大革命解释体系,经过他的几位学生尤其是阿尔贝·索布尔的继承和发展,形成被后来西方学术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解释或曰雅各宾史学,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占据着确定不疑的统治地位。

勒费弗尔这部著作的另外一大特色是,他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说明大革命对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意义,以及对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普遍意义,从而“获得了一种被早前的大革命史家们所排斥的视角”。^①

首先,通过比较,勒费弗尔澄清了法国革命“别具一格的特征”之根源所在。按照勒费弗尔的解释,第一个因素是欧洲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不同。在经济落后的中东欧地区,强大的王权对贵族阶级曲意迁就,贵族享有很大权力,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王权与贵族两厢结合维护着较为稳固的专制统治。在经济发展的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已融为一体,共同促进经济进步,政治上则是社会精英阶层共享权力的君主立宪制。而经济上介于两者之间的法国,其君主制亦介于两者之间,“它不同于英国,因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享政权;它又不同于俄国和普鲁士,国王并没有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法国在保留贵族特权的同时,让新贵族大量滋生,又让资产阶级成长壮大。”^②这种情形,使法国的阶级矛盾尤显紧张,“贵族同时与王权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一方面对压制他们的王权深怀忌

①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 to 1793*, p. xiv.

②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9页。

恨,另一方面又对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拼命排斥。”^①第二个因素是思想文化的差异。英国人重视经验论,“对建立一门确定科学的统一性和赋予科学结论以绝对价值的哲学不太重视”,在哲学上抛弃了不可求证的形而上学而趋向于感觉论。^②在政治上同样如此,英国人遵循传统,同时也熟悉自然权利,相信英国的制度是由英国人民独特的演变而产生的,英国的自由是“建立在先例、习俗和传统之上,而非哲学思辨之上”。而法国的启蒙哲人,无论功利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皆未能摆脱法国道德中笛卡儿和高乃依的先验理性传统,他们张口是维护自然法,闭口是根据人类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权。

其次,勒费弗尔通过比较英、美、法革命,析出了法国大革命所创生的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物事——对平等的强调。在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协力统治着社会和掌控着政府的英国,“没有人喜欢谈论平等;实际上,统治阶级认为要根据出身和财富分配公民和政治权利,将权利平等视为战争的发动机,势必朝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翻转既存社会等级。”^③而美国革命,如同1688年英国革命一样,它的“成功建立在土地贵族与金融家、商人、船主和制造商等上层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革命领导人闭口不提权利平等,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不承认合法特权的国家这样乃理所当然之事,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原则能够为下层阶级的种种要求提供口实。”^④而法国大革命则与此不同,它强调平等的原则并将之在社会领域里付诸实施,它的价值和实践,对今天的世界仍具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勒费弗尔之所以将他的史学目光延伸到拿破仑时代,不仅是因为在他看来,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

①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39页。

②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54—55页。

③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 to 1793*, p. 82.

④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76—78页。

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制统治”,以保证革命成果在法国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将革命成果推广到了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正是因为他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各国,使他得以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物载入欧洲文明史册,而是“占据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①

三

勒费弗尔在治学上讲求专业精神,他曾为准备博士论文走遍弗兰德斯数百个村庄,那可能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②即便退休后的晚年亦复如是,79岁时,他还乘公共汽车或在农夫的搀扶下探查奥尔良各市镇的档案记录,他将这个行程描绘为自己的第三个蜜月,第二个蜜月是30年代他为《1789年的大恐慌》搜集资料的游历。^③他总是喜欢不断地积累资料,对他来说,历史必须建立在“博学”(érudition)的基础上。他坚持“没有广博的学问和深湛的知识就没有历史”,^④认为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新的资料,即便在自己的最后一篇论文里仍然继续孜孜不倦地介绍着新史料。^⑤他尖锐地批评没有建立在扎实资料基础上的史学著作和在学术研究路径上偏向于诠释的史学家,对思想史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因此,即便杰出如J. L. 塔尔蒙、卡尔·贝克尔的著作皆成为他评论中的靶子。^⑥对于

① 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4页。

② R. C. Cobb, “Georges Lefebvre”, *Past and Present*, No. 18 (Nov., 1960), p. 59.

③ Cobb, “Georges Lefebvre”.

④ 转引自王养冲:“论法国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载《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⑤ Cobb, “Georges Lefebvre”, p. 62.

⑥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reviewed by Lefebvre 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131 (1953). pp. 182—184.

英国人或美国人的大革命史著作，他最经常的批评是基于二手材料，无论这些著作多么有趣或富有想象力，都判之以“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①他认为这是因为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学家研究工作不够耐心或不够努力所致。

在法国大革命史领域，一生勤勉不辍且态度严谨的勒费弗尔，创造的不仅是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更带来史学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创新。这其中之一即是，他是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先驱。他通过统计旧制度末年法国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表明土地问题是农民革命爆发的主因；通过统计大革命期间的土地转移情况，说明革命变动促进了农村产业主的形成和法国小农式资本主义的成长。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已开始关注农村的“生计问题”，并出版了相关的资料集，^②而此时，奥拉尔、马迪厄以及其他史学家仍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政治和宗教史。

勒费弗尔的这种史学视野和方法，与他对历史的认识密切相关，他坚持认为史学家应该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研究占总人口大多数的群体，也就是研究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的“社会结构”(structures sociales)，而不仅仅研究构成上层阶级的少数人。1932年，在悼念马迪厄的文章里，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马迪厄仍然只注意政治和复杂的派系，而忽略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情感需求，声称“未来的历史学家决定要自下而非仅仅自上考察革命事件的话，那么他们将把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研究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③在勒费弗尔看来，廓清社会结构的唯一可靠的路径，就是利用统计学方法，统计学方法能够准确清晰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变化态势，是使历史具有科学特征的工具，因此，他常常将“要研究历史，必须学会统计”挂在嘴边。^④

① Cobb, "Georges Lefebvre", p. 62.

②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s subsistances dans le district de Bergues*, Vol. 1, Lill, 1914.

③ G. Lefebvre, "Hommage à Albert Mathiez",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54, p. 21. 勒费弗尔对马迪厄的悼词原刊载于1932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杂志的纪念号上。

④ Lefebvre, "Un colloque pour l'étude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147(1957), pp. 100—101.